

客家研究輯刊

葉選平題

1997 年第 2 期(總第 11 期)

嘉應大學客家研究所

客家研究辑刊

1997 年第 2 期

(总第 11 期)

主 编:房学嘉

责任编辑:房学嘉

责任校对:肖文评

目 录

客家民系本质的自然科学证据…………… 叶智彰(1)

客家文化新论(续)…………… 林 浩(8)

客家精神及其理论问题…………… 张应斌(70)

客家民俗研究

东江流域的宗族社会和民间宗教

——一个客家村落的田野调查…………… 李泳集(86)

客家与风水术…………… 罗 勇(108)

闽西客家传统习俗调查…………… 周立方(129)

龙川县黄石镇公洞村岁时习俗…………… 何福添(166)

蕉岭县庵庙经书的佛教特色…………… 赖雨桐(183)

客家与太平天国研究

反对和镇压太平天国的客家人…………… 刘佐泉(189)

太平天国残部在嘉应州的覆灭及其原因浅析… 陈干华(206)

客家名人名作研究

叶剑英对解放华南的卓越贡献…………… 丁晋清(212)

时代精神和审美意味的有机结合

——读《叶剑英诗词选集》…………… 赖贤传(229)

国际客家学会通讯

国际客家学会在新加坡举行会员大会暨选举产生

第二届理事会、执行委员会 …………… (239)

国际客家学会第二届理事会成员通讯地址…………… (240)

客家民系本质的自然科学证据^①

叶智彰

客家的本质是什么？客从何处来？是纯粹的汉族还是汉化了了的少数民族？不少人希望能用简单的几句话作出正确的回答，但这是难做到的。例如，在有些旧辞典中称客家人相传是赵王勾践的子孙；在新的辞海中称客家是汉族的支系，相传西晋末永嘉年间（4 世纪初），黄河流域的一部分汉人因战乱南徙渡江，至唐末（9 世纪末）以及南宋末（13 世纪末）又大批过江南下至赣、闽以及粤东、粤北等地，被称为“客家”，以别于当地原来的居民；一些外国记述有的把客家人认为是有别于汉族的另一种族。以上的论点不是错误的就是没有把问题说清楚。在客家学研究中对客家民系的本质主要有如下一种共同认识和三种不同观点。

共同认识就是客家先民是古时南迁的中原汉人。中原汉人南迁，有史料记载者始于秦代，但不是所有南迁的中原汉人都是客家民系的先民，它还包括了广府、福佬等民系的先民。客家先民自中原迁居南方，一般认为大的迁移有 5 次。第一次大迁移从汉末至东晋，受东汉末年黄巾起义和东晋“永嘉之

^① 本人是梅州市梅江区人，长期从事灵长类学研究，但对我们客家人的源流与本质也很感兴趣，最近因云南客家文化研究会决定本人担任《客家人在云南》一书主编，有机会翻阅较多有关客家研究资料，就在此基础上写了这篇文章，如能对客家研究有帮助，我将很高兴。

乱”影响，中原汉人南迁至长江流域的洞庭湖、鄱阳湖和太湖三大湖区域，但到达鄱阳湖区域的中原汉人才是直接的客家先民。第二次大迁移从东晋至五代，受安史之乱八年、黄巢起义动乱十几年和五代纷争的影响，汉人从长江流域主要是鄱阳湖区域南迁到赣南和福建汀州地区。到达这一地区以后形成了客家民系，所以以后三次的大迁移实际上是客家民系的扩散。第三次大迁移是在宋元朝代，金人南下、元人入主，客家人的一部份又由闽赣分迁至粤东粤北。第四次大迁移是在明末清初，明末政治腐败，又值连年荒灾，后来清兵南下，大批客家民众分迁至粤中及滨海地区，及至川、桂、湘、台湾，且有一小部份迁至贵州南边及西康之会理（今属四川省，靠近云南省）。第五次大迁移是在清代，这次客家人的迁移属于世界范围的迁移，受广东西路事件和太平天国起义的影响，部份客家人分迁至广东南路、海南岛、台湾、香港、澳门、南洋群岛、甚至远至欧、美各州。其他零星迁移在历史上从未间断。通过上述历史性迁移，而今成片客家人居住并讲客家方言的省份有广东、江西、福建、广西、湖南、四川、台湾、海南 8 个省区 200 多个县市，其中闽粤赣交接地区最为集中。

客家民系本质的三种不同观点的第一种认为客家人的祖先从中原迁来，“是纯粹的汉族”。代表这种观点的人如台湾学者陈运栋、邓迅之（见陈运栋：《客家人》第 150 页；邓迅之：《客家源流研究》第 244 页。台中市天明出版社，1992 年。转引自钟文典：客家与客家研究的几个问题。《客家研究辑刊》1996 年第 2 期，第 14—29 页）。持这种观点的人不可能是多数，因为从第一次大迁移到第二次大迁移到达赣南和福建汀州地区并定居下来形成客家群体经历了五百年以上的时间，超过了

二十代人,而不是短时的一次或两次急行军,不可能不与当地土著居民通婚融化而保持纯粹的中原汉族血统。

第二种观点是客家民系以汉族为主体,承认与古百越族的支系畬、瑶、苗、仡等族特别是畬族通婚和血缘交融。持这种观点的人占多数。最早是客家学开拓者罗香林于1933年著《客家研究导论》中提出“客家先民与畬族通婚,血缘交融(转引自朱洪:谈畬族与汉族客家民系的文化互动关系。《客家研究辑刊》1995年第2期,第22—39页)。钟文典称,客家本来就是生活在北方的“土著”居民,汉族中的一支民系。在漫长的往南迁徙过程中,与百越诸族互相交流,互相影响和互相融合,有的转化为汉民族的其它民系或其它民族的成员,有的则在交流过程中影响和融合了别的民系或民族的居民,保留了客家的本色,即今日遍布海内外的客家(钟文典:客家与客家研究的几个问题。《客家研究辑刊》1996年第2期,第15页)。根据这种论点,除了强调客家民系以汉族为主体以后,似乎认为是客家人南迁而不是中原汉人南迁并与其他民族融化形成客家民系。这与前面提到的共同认识形成鲜明对照。

第三种观点是较少数的中原汉人带着当时较发达的中原文化融化于南方较多的古百越族中,形成以中原文化为主体的“客家共同体”。也就是说,客家民系在血缘上古百越族的一支畬族成份大于汉族,提出这种新的观点需要勇气和充足的证据,房学嘉指出:“历史上散居于闽粤赣三角地区的少数中原人跟当地古百越人等少数民族妇女通婚,建立家庭,其后代的语言、文化习俗自然跟随母亲的民族,此即客话叫阿姆话之故。客家话的母语是闽粤赣三角地区古百越族语。客家话中夹有相当多的中原古音,则是南迁的中原汉人带来的。由于南

迁的汉人因闽粤赣山区信息闭塞,交通落后,其人数任何时候与当地土著相比都是少数。这些少数中原汉人由于文化素养较高,往往自命不凡,……”。“客家共同体由古越族遗民中的一支与历史上南迁的中原人融合、汉化而形成。”“历史上并不存在客家中原南迁史。”“古越族人口基数大。根据生物进化规律,应是越族人同化了中原流人。而属于少数的中原流人则用中原科学文化教化了客地人民”(房学嘉:《客家源流探奥》,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1994。第51、155页)。

研究客家人群体的科学属于人类学的范畴。广义的人类学与其他很多学科不同,它包括了社会科学,也包括了自然科学。前者如历史学、考古学、社会学、民族学、语言学、民俗学等等;后者如古人类学、体质人类学、人种学、人类遗传学等等。从大量客家学研究的论著及历史资料看,大都属于社会的科学范畴。由于缺乏某些历史资料,有些结论只是假设的或是推理的。尽管某些结论接近正确,但缺乏现今事实作为依据,即缺乏自然科学证据。笔者是自然科学工作者,从事灵长类学研究(人类属于灵长类),1996年9月有幸参加了北京香山科学会议(它是中国最高层次的学术会议,与会者为教授、研究员、院士),会议的主题是人类学。由于事前云南客家文化研究会已决定笔者担任《客家人在云南》一书的主编,所以特别注意有关中国现代人群体的研究。中国科学院遗传研究所研究员杜若甫教授所作的关于这方面的研究报告引起了笔者的很大兴趣。他用现代遗传学研究方法和手段(包括分子遗传学手段),采用多种指标,检测了我国多种人群体大量个体,分组中包括了北方汉人、北方各个少数民族、南方汉人、南方各个少数民族(南方汉人中包括了客家人群体和其他群体),大量数

据通过微机处理,测定出了各组之间的遗传距离。有趣的是:相对地说,北方汉人与南方汉人及南方少数民族之间,和北方少数民族与南方汉人及南方少数民族之间的遗传距离较大,而北方汉人与北方少数民族之间及北方各少数民族之间,和南方汉人与南方少数民族之间以及南方各少数民族之间的遗传距离较小。遗传距离越小意味着亲缘关系越接近。上述情况被认为是汉人同化少数民族,把少数民族融入汉族的结果,并使南北汉人相对地成为远缘(远亲)。而使北方汉人与北方少数民族,南方汉人与南方少数民族相对地成为近缘(近亲)。这一结果似乎支持了房学嘉的观点。这也说明我们汉民族是善良的、能团结和融纳其他民族的一个民族,而不是像欧洲白人那样殖民美洲新大陆时采取残忍手段消灭印地安土著居民。现今36万多畬族中大部分人操客家话也足以证明客家人与畬族间融合的民族关系。当然,在历史上存在过民族压迫与反抗,有时少数民族是被迫融入汉族的,但客畬联合起义反抗统治者的事例也不少。

上述我国现代人群体遗传学研究结果似乎也支持了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理论。当今世界现代人种,以前曾分为欧罗巴人种(白种)、尼格罗——澳大利亚人种(黑种)、马来人种(棕种)和蒙古人种(黄种),现今人类学学者归为白种、黑种和黄种,原来的棕种被认为同属于黄种。在动物分类学上这三种人种属于亚种关系。中华民族虽然分为五十六个民族,大部分属于黄种人,再追根源远一点,比如古代当人群分离出来并扩散开来以后,由于地理隔离等原因,各群体各自形成了不同语言文化的族群,各族群间由于缺少交流通婚,基因交换较少,随着时间的推移,也就产生了上面所说的遗传距离。正是由于

这种原因形成了中华民族的多元化或超异。现今由于人类社会的进步,交往增多,各族群通婚融化加快,基因交换增加,各族群间的遗传距离将会继续逐渐缩小而趋同。

人类起源研究同样存在着争论。古人类学家以前认为从猿进化成智人(现代人)经历了大约一百万年的时间,随着古人类化石的不断发现和用新技术测定年代的进展,现在一般认为经历了二百五十万年至三百万年。先前爪哇猿人和北京猿人的发现,人类起源于亚洲说占主导地位,随后在非洲发现了较多年代更早的古人类化石,现今人类起源于非洲说占主导地位。由于古人类化石分布很广,包括亚、欧、非三大洲,人类起源的多元论者为数不少。随着分子遗传学研究的进展,遗传学家的观点引起了人们的注意。现已研究出灵长类中线粒体 DNA 硷基替换速率为平均每百万年 2%,由此推算出人类共同祖先是 20—50 万年前生活在非洲的一个叫“露西”的妇女(即一元论),并认为当时生活在世界各地的猿人均已灭绝。这一观点与古人类学家的观点差异太大,不为古人类学家所接受。两者意见能否趋于统一取决于各学科研究取得新的突破。

综上所述,人类有共同的祖先,群体扩散以后由于地理隔离等生殖隔离因素,各群体间缺乏基因交换而产生了遗传距离,进而产生了不同的人种和族群,族群间由于缺乏交流而产生了语言文化差异,即趋异现象。随着人类社会的进步,在有历史记载以来,一反史前的趋异现象而走向趋同,各族间加速融合。就中华民族而言,北方汉人加速与北方少数民族融合;南方汉人加速与南方少数民族融合。上述遗传距离的南北界线就是这一观点的自然科学证据。客家群体的形成和发展就

是这一观点的实例。是中原汉人南迁而不是客家人南迁。南迁的中原汉人与古百越族的支系主要是畬族融合形成了客家民系,且畬族不占少数。如果认为畬族占少数的话,就无法解释上述遗传距离研究的南北界线。1600年的客家民系形成和发展史在人类发展的历史长河中只是短暂的一刻。

以上论述只是一位自然科学工作者以自然科学观点参加客家民系形成和发展问题讨论的一点见解,并提供一点自然科学资料。

客家文化新论(续)*

林 浩

(接上期)

5. 与黎族文化的文化接触

黎族亦为原百越诸部族之一,历史上曾有俚、岐(杞)、美孚等不同的自称和他称,一直生息繁衍于海南岛上。清朝初叶,客家开始大规模进入海南垦殖,自北至南与黎族开始发生文化接触,直至如今。

(1) 地理空间层面的接触

现在黎族约有 111 万余人,全分布在海南省。而海南各地均有客家社区散布,全岛便成为两种文化在地理空间上接触的舞台。

由于包括客家在内的汉族的大量涌入,原先遍布全岛的黎族文化区域已被切割分离得支离破碎,由此也使客家与黎族的文化接触锋面大大地缩小了。今日尚存的最大的黎族文化区域,是以五指山峰为圆心的五指山黎族文化区,其他基本上属离岛式的小型文化圈了。因而,与客家的文化接触现在主

* 拙文为提交第三届国际客家研讨会(新加坡国立大学、香港中文大学等主办,1996年11月,新加坡)讨论用论文。研讨期间曾面受大会执行主席陈松沾先生、中山大学司徒尚纪先生、暨南大学李如龙先生、香港中文大学刘义章先生和嘉应大学房学嘉先生诸多教示,返日修改时又承东京都立大学渡边欣雄先生、东北大学濑川昌久先生赐教,在此一并致谢。

要是属于文化圈外缘切线接触的形式,基本上见不到黎族文化原包围客家文化圈的形式。两者同样点缀于福佬文化和广府文化的大海中,形成一种多元文化共存的模式。

从今日的行政区域上看,客家与黎族发生文化接触的地区为:陵水、儋州、白沙、琼中、三亚、屯昌、万宁、琼海、澄迈、临高、定安、文昌等县市。著名的客家文化圈有儋州的那大、南丰、祥发、怀集,临高县的和舍等。除此之外,岛西南部的不少黎族聚居区,如珠碧江和昌化江流域,现在是否存在着客家与黎族文化的共生区,还有待于今后的田野调查。

(2) 历史时间层位的接触

两种文化发生接触的历史时间层位,应始于清初的康熙年间。

黎族源自百越之一的骆越,六朝末期至隋唐大量进入海南,经过长期的发展,形成了具有鲜明特色的黎族文化。但由于困守山区等诸多的因素,使得客家人并无福佬民系那样得航海之利,以渡海登陆进入这偏远山地垦殖,诱发与黎族文化的接触。

清朝初期,尤其是乾隆十八年(1753)颁布“敕开垦琼州荒地”令后,客家开始大规模集团式入殖海南,从而揭开了与黎族文化接触的序幕。初期的客家移民主要来自嘉应州诸县,登陆后聚居于儋县南丰、祥发、怀集等地,被称为“老客”;道光年间之后,又从恩平、开平、高明、鹤山、新宁、阳江等地,移来大量的所谓“新客”。但不管老客还是新客,都比福佬和广府民系入琼要晚得多,大都不得不进入河谷上游和山间台地落脚。而至此时期,原先居于盆地和河流中下游平地的黎族,早已被先入之汉人逼得退入山区。因而,客家入殖海南之初,大多就与

黎族社区相邻,一开始就与黎族文化发生直接的文化接触。如儋县的那大镇,方圆五六十里都是“老客”,南丰镇也聚居着成片的新客,附近即是黎族的村落,至鸦片战争前全为黎族的居住区。(司徒尚纪,1994)正是因为两者都邻接太近,时时还为土地等经济原因发生冲突。由此看来,在近代之前客家与黎族之间的文化接触,远远要比今日的规模大得多,频繁得多,直接得多。

值得补充的是,清初之后客家与黎族的文化接触并不止于海南岛一隅。隔海相望的大陆雷州半岛及周围区域,即雷州、廉州、高州、钦州等,当时亦是黎族文化区。(罗香林,1955)正值“迁海令”废除之后,客家已开始入殖廉州之地,因而两者在雷州半岛亦有过大规模的接触。

6. 与仡佬族文化的文化接触

客家与仡佬族亦存在着一定程度的文化接触。因为最大的仡佬族文化圈的广西罗城县及其周边地域,也是清初之后客家的聚居地之一。

作为桂北地区客家文化接触的重要对象之一的仡佬族,自称“伶”或“谨”,史称“姆佬”或“木佬”,大概是源于魏晋以来的百越之中的“僚”或“伶”,生息于岭南地区。明代之时,先于客家进入今罗城及其周边的小型盆地定居,形成了具有南方特色的仡佬族文化。

(1) 地理空间层面的接触

现在的仡佬族文化圈主要分布于柳州西北的罗城县,以县城所在的东门镇为中心,西南涵盖四把,东北接近长安,东部接近古砦,西北接近天河,形成一个大型的仡佬族文化板块。在该板块周围的罗城县境内,甚至近邻地区的宜山、柳城、

忻城、融安、柳江等县, (知识出版社编, 1994) 还点缀着不少规模大小不等的仫佬族文化圈。目前, 仫佬族约近 20 万人, 大部份聚居于东门仫佬族文化板块之内。

客家与仫佬族的文化接触形态亦可见到两种形式。

其一是板块内缘与文化圈外缘的接触, 这主要见于东门文化板块一地。在东门盆地, 以村落为单位的客家超小型文化圈往往被仫佬族文化切割开来, 使其外缘与仫佬族文化板块的内缘发生密切的接触。

其二是文化圈外缘的切线接触, 在除了东门板块以外的罗城县境内, 甚至包括宜山、柳城、忻城、融安、柳江等县, 小型的客家文化圈与小型的仫佬族聚居村落间接分布, 与壮、侗甚至其他文化共生。因为多以自然村落为分布主体, 两种文化圈常常发生外缘的切缘式接触。

(2) 历史时间层位的接触

客家文化与仫佬族文化发生文化接触的历史时间层位的上限, 应在清代乾隆年间左右。

比起客家民系来, 仫佬族先行一步进入该地区, 形成了别具一格的仫佬族文化社区。上已提及, 仫佬族原为百越中的一支, 活动于南方各地, 元明之时进入罗城及其周边山地定居下来, 成为该地的先住民。

清朝乾隆年间起, 客家从西江循浔江、黔江、柳江而上, 再上溯到其支流融江和环江流域, 在河流台地和山间盆地拓殖, 引发了与仫佬族文化的接触。这种接触有三个峰期。

A. 第一接触峰期 时在乾隆年间, 在清朝前期的客家文化大移动中, 一批客家移民首先进入该区域, 在连成一体仫佬族文化中, 形成不少的小型客家文化岛。带来客家文化的这

些移民,主要是来自广东梅州的梅县、兴宁,亦有少量来自福建汀州的宁化甚至江西南部诸县。

B. 第二接触峰期 时在咸丰、同治年间,在广东西路长达 12 年的土客械斗平息之后,不少客家移民从械斗纷争地阳江、恩平等县直接移入,或西进广西贵县、桂平、平南和广东信宜等地落脚数代之后,再间接北上迁入罗城。

C. 第三接触峰期 时在本世纪六七十年代,据笔者所知,当时由于广西东南部客家社区的人口与耕地的矛盾进一步激烈化,在地方政府的鼓励之下,陆川等县的不少客家人,再次集团北上进入罗城及其周边地区,在河溪狭小的台地上拓殖,由此更接近仡佬族的各小型文化圈,导致接触更加频繁起来。

7. 与侗族文化的文化接触

据目前所知,客家文化与南方主要少数民族之一的侗族,也发生相当规模的文化接触。

侗族是南方的原住民族,现约有 250 余万人,主要分布于贵州东南、湖南西南以及广西北部地区。此外,湖北省西部的恩施地区亦散居着为数不少的侗族北上移民。

(1) 地理空间层面的接触

从宏观地理上看,其接触形态为两种文化圈的边缘相互发生界接的形式。即侗族文化圈的东南部边缘,与广西客家文化圈的北部边缘,发生小面积的界接。其接触区既是侗族文化圈的最东南部的末梢区域,亦是广西客家文化圈的最北部的末梢区域。两种文化在此均呈弱势,加上又与苗、壮和其他汉族文化同时交叉分布,相互之间的影响较为弱小。

A. 广西客家·侗族文化接触区

侗族文化圈从贵州东南部延伸进入广西北部,集中分布或散布居于三江、龙胜和融水、罗城和融安等县。恰好此数县又是清初客家移民的拓垦区域,因而两种异质文化在此接触。因为此地区客家多在主要河川两岸台地聚居,而侗族则居于近山的山地,各以自然集落为单位,故接触主要为小型文化圈之间的切线接触形式。如在三江侗族自治县,客家聚居的古宜镇,其东西两边均为侗族文化区;老堡客家聚居区,其西部亦为一个连成一片的侗族文化区;苗江西岸的同乐乡,客家亦同侗族村落接近。在融水,客家聚居的大浪,西部亦为侗族聚居的村落。

B. 贵州客家·侗族文化接触区

在贵州省行政区内,客家与侗族文化发生接触的有从江、榕江和天柱三县。

贵州境内的客家分布,三十年代罗香林氏曾指出有遵义、馀庆和榕江三地,但也许是自觉证据不足,五十年代初撰《客家源流考》时,仅剩榕江一县,根据是贵州出身的学生转告之故。七十年代《客家研究导论》在台北重版时,又全部予以剔除。其实,贵州东南部的客家分布,完全是广西客家分布的延长,因为该区域与广西的客家分布区仅一界之隔,如融水、三江等地的客家,当年就是溯融江和都柳江而上拓殖的,他们再进一步溯流而上,进入贵州的都柳江上游两岸拓垦荒原,完全在情理之中;而遵义及其所属馀庆的客家,则是四川客家分布的延长,因为该地近接四川的客家拓殖区,当年广东、福建等地的客家西迁四川,就大都途经遵义的,而且遵义清代就曾隶属于四川。

从江、榕江和天柱的客家分布,已为古进氏近年的调查所

证实。其中从江的东北部就是大型的侗族文化区,南、西、北三面也点缀着数块小型的侗族散居地;榕江的正北面,也连接大型的侗族文化区,东南和西部则与侗族散居区接壤;天柱的客家地域,则处于全国最大的侗族文化圈之中,应属于客家小型文化圈的外缘与侗族大型文化圈的内缘相接触的形式。

(2) 历史时间层位的接触

总体上来说,客家与侗族文化接触的历史时间层位,大致始于清代乾隆年间而延续至今。

从侗族方面来看,侗族大概是先于客家而定居于今日广西和贵州的接触区域的。侗族属南方原住民百越中的骆越支系,大致秦汉时代被包括于“骆越”,魏晋南北朝时代被包括于“僚”之中。“唐宋时期僚人已开始分化,侗族从僚人中分离出来,大致在公元十世纪的宋代。”宋代已作为单一民族,被称之为伶、仡伶、仡佬,明清文献则多称为洞僚、洞人、峒人、洞家、峒苗等。侗族先民一直在南方生息繁衍,他们在客家进入广西北部及贵州东南地区之前,已在今日之接触地带定居,这是毫无疑问的。

但是,值得注意的是,对侗族何时定居于现今区域及迁移问题,侗族问题学者亦各执一是。其中“土著说”主张侗族自古以来就生息繁衍于现居住区域内;“外来说”则主张侗族先民是从梧州溯河而上定住的;“融合说”则主张以土著为基本成份,在长期的历史发展中融合了从外地迁来的其他民族成份而成的。其中的“外来说”和“融合说”,其根据就在于:其一,为数不少的侗族,传说自己的先祖来自江西吉安府吉水;其二,侗族区域南端的侗族,传说自己先祖是从广东、广西溯珠江水系而上最后定居的;其三,部份侗族传说来自福建。综合这些